

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校“下乡实践”与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关联研究

晋亚静 喻颖

广州理工学院 广东 惠州 516122

【摘要】：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推进，使乡村成为涵养文化自信的重要场域，高校“下乡实践”活动则成为青年学生与乡村文化的连接纽带。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文化观，通过分析该实际活动，揭示其在激活学生对乡村物质、精神和制度文化认知中的作用，论证“下乡实践”如何通过“感知—认同—转化”的路径培育学生的文化自信。研究发现，高质量“下乡实践”不仅能弥补高校课堂文化教育的场景缺失，更能让学生参与乡村建设，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整体认知，构建起兼具情感温度与理性深度的文化自信。

【关键词】：乡村振兴；高校下乡实践；文化自信；实践育人；马克思主义文化观

DOI:10.12417/3041-0630.25.24.014

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（人）对身处其中的文化，通过对象性活动所形成的对自身文化确信和肯定的稳定心理特征。^[1]其培育既需理论认知，更需实践体验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”“推进文化自信自强”，二者的战略叠加为高校育人工作指明新方向——乡村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，而高校“下乡实践”的育人模式，恰能成为培育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。

学界对“下乡实践”的研究多侧重技术服务、人才输送等功能，对文化育人的研究多停留在文化传播上，未能充分揭示实践和文化自信培育之间的关联；而文化自信培育的研究则侧重课堂教学、理论宣讲等形式，对乡村的实践价值研究不足。马克思主义认为“实践是认识的来源”，学生对文化的自信，是对文化价值的认同，而这种认同须建立在对文化真实形态的感知和参与上。乡村振兴背景下，乡村文化从静态存在转为动态的生产性存在——传统技艺的现代转化、红色资源的活化利用、基层治理的文化逻辑，都为学生提供了触摸文化真实样本的机会。

本文从马克思“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的理论^[2]，从下乡实践的具体形态出发，分析其如何通过搭建理论—实践—认同的桥梁，帮助学生突破对文化的抽象认识，建立具象认同，培育文化自信。

1 乡村振兴为高校“下乡实践”与学生文化自信培育提供耦合场域

乡村振兴是经济、社会层面的振兴，更是文化层面的振兴。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》中指出：“推动乡村文化振兴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”^[3]，使乡村从经济帮扶对象转为文化育人主体，为高校“下乡实践”与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耦合提供现实基础。

1.1 乡村文化资源的“活态化”为文化自信培育提供素材支撑

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，文化是“人化的自然”与“自然的人化”的统一^[4]，本质是人类实践的产物。乡村振兴背景下，乡村文化不再是抽象的符号，而是融入现实的活态资源：在浙江松阳，古村落保护与当地民宿经济结合，让夯土墙、木构房成为可体验的传统文化；在陕西延安，红色窑洞与乡村文旅结合，让革命故事成为可感知的革命文化；在贵州遵义，“村BA”与民俗活动结合，让集体主义精神成为可参与的先进文化。这些活态文化为“下乡实践”提供了大量素材，使学生跳出书本，直观感受文化的当代价值，为培育文化自信奠定基础。

1.2 乡村建设的“实践性”为“下乡实践”提供价值载体

实践是价值实现的途径，学生的文化自信不仅需要认知认同，更需要价值认同——认识到文化能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现实力量。乡村振兴中的各项建设任务，如乡村规划、产业升级、基层治理等，为“下乡实践”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课题：学生可参与传统村落的数字保护，用技术延续文化血脉；协助乡村搭建电商平台，推动特色文化产品走向市场；参与修订村规民约，理解乡村治理中的文化逻辑。在实践中，学生不仅能看到文化对乡村发展的作用，更能感受到自己作为文化参与者的价值，增强学生文化自信的稳定性。

作者简介：晋亚静,1996年,女,汉族,河南省伊川县,硕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: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。

喻颖,1998年,女,汉族,湖南省浏阳市,硕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: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。

1.3 城乡互动的“双向性”为文化自信培育提供认知维度

毛泽东在《矛盾论》中指出：“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：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，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。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，而每一次的循环（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）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，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。”^[5]学生的文化自信，应建立在对文化差异性与整体性的认知上。乡村振兴推动的城乡融合，使“下乡实践”不再是单向的文化输送。例如，在江苏昆山，学生协助乡村开展“智慧农业”建设，也了解到“二十四节气”的农业智慧；在广东潮州，帮助非遗传承人设计文创产品，也从“潮绣”技艺中感悟“工匠精神”。这些双向互动既让学生看到乡村文化的独特价值，又看到其与现代文化的融合，从而跳出城乡对立的刻板认知，建立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认知，为文化自信培育拓展途径。

2 高校“下乡实践”培育学生文化自信的内在机制

“认识的过程是实践—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的循环上升过程”^[6]，高校“下乡实践”对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，并非简单的文化灌输，而是通过感知—认同—转化的递进机制，让学生在实践中完成对文化的认知深化与价值内化。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：

2.1 感知层面：“沉浸式实践”激活文化认知的“具象化”

文化自信的起点是认知，传统课堂中的文化教育多以抽象符号呈现（如书本中的革命故事），容易导致学生认知悬浮——知道有什么，但不理解是什么或为什么。“下乡实践”通过沉浸式体验，让抽象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具象的生活体验，激活学生的感官认知和情感共鸣。

这种沉浸式体验主要有两种形态：一是观察式沉浸，如到安徽宏村，观察古人设计的牛形村落规划智慧，感受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理念；到江西井冈山，参观革命旧址，聆听老红军后代讲述战斗故事，体会坚定信念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。二是参与式沉浸，如参与云南大理的民俗活动，亲手制作扎染、品尝乳扇，在“做中学”中理解白族文化的生活逻辑；参与湖南韶山的红色宣讲，用方言向村民讲述革命历史，在“讲中学”中体会革命文化的传播价值。这种具象认知能打破文化与学生之间的距离，使文化从书本走进现实，为文化自信培育奠定情感基础。

2.2 认同层面：“问题式实践”推动文化价值的“理性化”

文化自信的核心是认同，而认同既需情感驱动，也需理性支撑——即理解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发展逻辑。高校“下乡实践”通过设置问题式课题，让学生在解决乡村实际问题时，思考文化的价值，实现从情感认同到理性认同的升华。

而问题实践的关键在于以问题为导向，将文化元素融入到具体任务中：例如，针对乡村非遗传承难的问题，学生需调研非遗技艺的历史、特点，分析其与现代生活脱节的地方，进而提出非遗+文旅等传承方案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学生不仅能理解非遗的文化价值（如剪纸、竹编中的民族记忆、审美理念和工匠精神），更能看到其经济价值（如转化为文创产品的可能性），从而认同非遗文化值得传承。再者，针对乡村基层治理难的问题，学生需要研究村规民约，分析其蕴含的邻里互助、集体协商等文化理念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学生能理解乡村治理中的文化智慧，进而认同传统治理文化，为现代基层治理提供借鉴。这种理性认同，是真正建立在对文化价值深刻理解上的坚定自信，而非盲目自豪。

2.3 转化层面：“创新性实践”实现文化自信的“行动化”

文化自信的终极目标是转化，即将文化的认同转化为传承和发展文化的行动。马克思主义认为，“认识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”，学生的文化自信若只停留在认知和认同层面，不转化为实际行动，便是一种空泛的自信。高校“下乡实践”通过创新性实践，为学生提供转化的平台，让学生的文化自信从思想层面走向实际行动。

创新性实践的核心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如学生在福建莆田调研木雕技艺后，结合现代设计理念，推出非遗元素+日常用品的木雕文创，让传统技艺走进现代生活；在四川凉山调研彝族民歌后，运用现代音乐制作技术，改编出彝族旋律+流行曲风的歌曲，让民族文化被更多人接受。这些实践既是对文化的传承，也是对文化的发展，学生在创新中，展现了对文化的认同，也体现了对文化的自信，这种自信也是一种敢于创新的精神。创新实践还能形成长效影响，部分学生会选择返乡创业，从事文化相关工作；或在校园中成立乡村文化社团；或结合自身优势直播推广家乡特产，持续推广乡村文化。这种付诸行动的文化自信，是最稳定、最有力量的，也是高校“下乡实践”育人价值的最终体现。

3 优化高校“下乡实践”培育学生文化自信的路径

高校“下乡实践”对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，但如今部分“下乡实践”仍然存在形式化、碎片化和重经济轻文化这些问题，未能充分发挥育人作用。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出发，可从三个方面优化路径：

3.1 构建文化导向的实践内容体系，避免形式化

当前部分“下乡实践”存在为实践而实践的问题：例如，简单组织学生参观乡村、慰问村民，缺乏文化教育；或只关注经济帮扶，推销农产品，忽视文化价值的挖掘。要解决这一问题，需构建文化导向的实践活动，将文化元素融入实践全过程。

可从三个维度设计：传统文化维度，设置传统村落保护、

非遗调研和民俗文化记录等课题,让学生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;革命文化维度,在革命老区设置红色故事采集、革命遗址保护和红色文化宣讲等课题,让学生去感悟革命文化;先进文化维度,设置乡村基层治理调研、乡村振兴案例分析和数字乡村建设等课题,在传承传统乡村文化的过程中,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,树立现代新乡贤典型,挖掘好其背后所隐含的精神价值和时代意义^[7],让学生理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。同时,建立实践审核机制,确保文化育人目标明确,避免走过场的实践,让学生在实践中有文化可学、有价值可悟。

3.2 建立校地协同的实践保障机制,避免碎片化

部分“下乡实践”还存在短期化和碎片化问题:例如,学生仅在假期开展一周左右的实践,缺乏对乡村文化的长期了解;高校与乡村缺乏长期合作,实践资源难以整合。毛泽东认为,“实践的深度决定认识的深度”,要培育稳定的文化自信,需要长期系统的实践支撑,这就要建立校地协同的实践保障机制。

例如,高校与地方政府、乡村建立长期合作关系,共建乡村文化实践基地(如非遗实践基地、红色文化实践基地),让学生能长期参与实践(如假期集中实践、学期中线上跟踪调研);整合校地资源,组建双导师团队,高校导师负责理论指导(如文化理论、调研方法),乡村导师(如非遗传承人)负责实践指导(如文化解读、实践操作),深化学生对乡村文化的系统认知。

3.3 完善知行合一的实践评价体系,避免重结果轻过程

部分“下乡实践”的评价体系存在重结果、轻过程的问题:例如,仅以实践报告、帮扶成果作为评价标准,忽视学生在实践中文化认知和情感认同的变化。文化自信的培育是内在、隐

性的过程,传统评价体系难以全面反映其育人效果,需完善知行合一的实践评价体系。

可设置三类评价指标:一是认知指标,可通过实践日志和文化调研报告,评价学生对乡村文化的理解;二是情感指标,通过实践反思和访谈记录,评价学生对乡村文化的情感认同;三是行动指标,通过文化创新成果(如文创设计)、长期参与意愿(如是否计划返乡从事文化工作),评价学生文化自信的转化程度。同时,采用多元评价主体,由高校导师、乡村导师、学生共评,确保评价的全面客观,引导实践从重结果转向重过程,真正实现以评促育。

4 结论

乡村振兴背景下,高校“下乡实践”与学生文化自信培育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:乡村振兴为二者提供了耦合场域,让乡村从文化资源库转变为育人实践地;高校“下乡实践”通过感知—认同—转化的机制,让学生在实践中完成对文化的具象认知、理性认同和行动转化,从而培育起学生的文化自信。

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看,这种关联的本质是实践育人,也就是通过改造乡村的实践,实现改造学生主观世界的目标。学生在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,不仅深化了对中华文化的认知,更找到了自身与文化、社会的连接,从而构建起个体—文化—社会的价值认同链条。

未来,高校需进一步优化“下乡实践”的内容、机制与评价体系,让“下乡实践”真正成为培育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;同时,也需关注实践后的长效影响,如通过校园文化活动、课程教学,持续巩固实践中的文化认知,让学生的文化自信得以长期坚定,最终培育出有文化自信、有实践能力、有责任担当的青年人才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刘林海.文化自信的概念、本质特征及其当代价值[J].思想教育研究,2016,(04):21-24.
- [2] 马克思.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1卷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2:135.
- [3] 中共中央,国务院.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(2021年1月4日)[Z].2021年第7号国务院公报.
- [4] 郝智浩,许春玲.马克思的文化观及其现代价值意蕴[J].人民论坛,2016,(14):182-184.
- [5] 毛泽东.毛泽东选集(第一卷)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91:310.
- [6] 王向清,黄倩柳.毛泽东关于认识运动的五重“循环往复”及其内在联系[J].吉首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3,44(02):82-89.
- [7] 蒲实,孙文营.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人才建设政策研究[J].中国行政管理,2018,(11):90-93.